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英〕M.I.芬利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英〕M.E.芬利 著

郭小凌 鄠子林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英)M. I. 芬利著;郭小凌,郭子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318-0

I. ①古… II. ①M… ②郭… ③郭…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29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英] M. I. 芬利 著

郭小凌 郭子林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318-0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386×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1/4

定价:19.00元

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Copyright © 1973, 1985 by M. I. Finle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iscataway, New Jersey

根据罗格斯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中译者序

摩西·芬利(1912—1986)教授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名字在古典学或古希腊罗马史领域却如雷贯耳,被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两位古典学家之一。

举凡学术大家,都是在他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既能做深入具体的微观分析,又能进行合理准确的中观、宏观归纳的人。而后一种能力又必须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理论思维为基础。芬利正是这样的人。在他学术生涯的中晚期,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古典世界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以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大问题上,在每个方向都能言他人所不能言,成就引起同行认真思考、发挥甚至热烈讨论的一家之言。就理论思维的高度,观点归纳的新颖、雄辩程度、学术视域的宽阔和对现代世界的了解而言,我个人以为西方古典学界至今无出其右者。

这本《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意义不可低估。这是20世纪的西方学界对古代与现代民主进行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引领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界的古代民主研究热,并使这一研究方向最终发展成为显学,积累出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高点:各种专题会议、文集、专著、展览层出不穷。在西方学界庆祝雅典民主诞生与现代民主胜利的狂欢声中,正是古典学界首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及时提



出冷静的质疑,显示出古典学人的深谋远虑和学术功力。当然,芬利没有看到这番热闹景象,但他的绝不循常习故的质疑与批判精神却没有随他而去,并显然得到了发扬光大。

芬利自言《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是与现代精英理论家们论战的产物。20世纪中叶,民主成为“政治正确”的人类自我管理形式不久,理论上的民享、民有、民治与现实中的精英决策与统治还明显貌合神离(顺便说一句,现在仍然如此),而精英理论家们却为民众对政治与选举的冷漠大力辩护,视之为民主的正常现象。芬利对此不以为然。他以古代民主的实践比照现代民主,认为18世纪以来对于古代民主的许多批评是违背事实的,古代民主才真正具有民主的实质,而现代民主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

芬利期望现代民主应像雅典民主一样,改变实际上的精英统治、选民只是政党政治家或蛊惑家对自身政策予以合法化的工具现象。当然芬利也有偏颇之处,他未指出古代民主也存在公民的政治冷漠问题,比如频繁的公民大会平时只有3,000左右的出席者,6,000便是绝对多数,而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却在30,000—40,000之间。但芬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古代直接民主与缺乏政党组织依托的政治家之间是反向的依附关系,缺乏组织支持的政治家很难操纵和决定议案是否能在公民大会上通过或否决,他们必须说服具有政治经验的与会者,并时刻小心谨慎,以免失去公民的信任。换句话说,现代民主弊病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用芬利的概括就是:“现在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共识,即对抽象的有关‘民主信仰’的一般陈述表示赞同的共识,这无疑不应否认。然而,问题是这种共识所反映的‘象征性的满意’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深



刻的沮丧,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流行的政治冷漠准确地记录下来。这种政治冷漠源于无能为力的感觉,源于不可能与那些在政府决策中占尽优势的利益集团进行抗争的现实。共识的代价乃是由被排除于共识之外的人支付的。”对照现实中的民主,情况依然如此,发达国家的选民在大选中一般只有50%的投票率,这意味一半选民对四五年一度的投票权持怀疑与放弃态度。对此,芬利尖锐指出:“政治冷漠远不是健康的民主制所必须的条件,而是对不同利益集团在决策领域的不均衡现象所做的退出反应。”这无疑对现代的民主崇拜思潮和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精英理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为什么芬利对民主精英理论嗤之以鼻?他的个人际遇可能是一个原因。芬利曾经是20世纪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在席卷美国的麦卡锡反共狂潮中,他被他曾经热心帮助过的德国流亡者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作者)出卖,被指为共产党员。他先后至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参议院内部安全分委员会接受审问,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自己是否是共产党员的问题。他所在的罗格斯大学董事会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压力之下,解除了芬利的教职。在连生活都无保障的情况下,英国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向他伸出了援手。芬利选择了剑桥大学,并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直到去世,他一直在剑桥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因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被女王封为爵士,并担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芬利众多著述的内容显示他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熟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解释常常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方法相似的地方。但他



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欣赏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不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方法和观点予以揶揄或批评,有意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似乎在避免授人以柄。

本书的内容,基于作者在自己先前的学校——罗格斯大学所做的学术报告。罗格斯大学在解聘芬利二十年后盛情邀请他作为新建的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的第一位讲演者,其用意不言而喻。

芬利认为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根本不同,理由是历史条件大变了,这里有黑格尔认识法的痕迹。笔者却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前者是后者的镜子,理由在于虽然两者有两千多年的间隔,但制订、实施、管理民主体制的人还是同类人,在生物学上属于同一物种,即人科人属智人种,因此基本人性未变,基本行为取向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这也是当我们阅读古典著作时,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古代与现代的界限,感觉古希腊人的追求、向往、基本行为方式与所作所为,同我们似乎没有多少差别,古人拨动的琴弦始终能在我们的心头引起共鸣。鉴于此,古希腊人对于社会人生以及各种政体(不应忘记,古希腊是古代唯一的各种政体的实验室)的认识和实践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参考与借鉴的对象。

郭小凌

2015年7月15日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1
第一版前言	3
第一章 领袖与追随者	5
第二章 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	32
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59
第四章 苏格拉底及其后	84
第五章 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	107
注释	130
索引	148



第二版前言

在当今西方世界，人人皆是民主分子。这是一种与一百五十 ix
年前的流行状况迥然有别的变迁。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部
分原因在于最初的古希腊民主理念中的平民参与思想由于一种理
论的传布而大为减色，该理论认为缩减平民的参与成分是合情合
理的。这种通常被称作精英的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有在
职业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寡头集团的治理下才能运转并幸存下
来，必须把平民的参与局限在偶尔举行的选举范围之内。换句话
说，平民的政治冷漠是件好事，乃是社会健康的标志。

1972年，我在美国做了几次演讲，意在同这种精英理论进行
论战，本书的核心内容便由这些演讲所构成。如我在第一版前言
中所说，我不是以政治学家或理论家的身份，而是以专业历史学家
的身份来撰写这本书的。在讨论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时，我尽力 x
在可能的限度内使古希腊人的观念与近现代人的观念进行对话。
我相信这两个社会中的每一个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另一个社会。并
非任何人都能理解我试图做的事情，而且有些人还完全误解了我
(我的朋友卡米尼·阿姆波罗[Carmine Ampolo]在为本书意大利
文译本第二版所作的后记中指出了这一点)。但我始终坚信这样
的对话方式。在目前这一版中，我增补了两篇先前发表的文章，希



望这两篇文章将澄清和详细阐释我的思想。我也在书中做了些许改正，在注释中加了若干较新的参考材料。

M. I. 芬利

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

1984年11月



第一版前言

作为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Mason Welch Gross Lectures)^{*} xi
的第一位演讲者,我4月份^{**}在新布伦瑞克(New Brunswick)^{***}做
了三场演讲。本书内容便由这些演讲组成。尽管我对讲稿做了稍
许扩充、修改和注释,但文本内容并没有实质改变。这个题目,在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种方式,证明我的做法似乎是恰当的:我
既以古史专家的身份进行讲演,又用古代(希腊)的经验阐述当代
的重要论题——民主理论。这样的讨论曾经颇为常见,现在却已
被废弃。但罗格斯大学的听众表现出的兴趣,至少表明我的想法
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方式。

赋予我这一新的系列演讲的机会乃是一次出乎意料的、令我
欣然接受的荣誉,因为最重要的是它允许我向梅森·格罗斯表示
我个人的一份敬意,我已熟知并仰慕格罗斯多年了(他也是我在剑 xii
桥学院的同事)。阔别二十年之后,我与妻子在新布伦瑞克和纽瓦

* 梅森·韦尔奇·格罗斯是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又称罗格斯大学)第十六任
校长(1959—1971)。为纪念他对大学的贡献,该校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讲座。——
译者

** 1972年4月。——译者

***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新布伦瑞克分校。——译者



克(Newark)度过的八天无法仅仅用温暖和亲切之类的话语来表达。在此,我谨向新布伦瑞克的接待人迪克(Dick)和苏赞尼·施莱特(Suzanne Schlatter)以及纽瓦克的接待人贺拉斯·德·波多尔德(Horace de Podold)表示特别的感谢。而其他带给我们快乐的老朋友和先前的学生,相信会谅解我无法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

我还必须对我的友人和同事——基督学院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表达感激之情,他在我准备这本书的很多时间里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我也必须感激我的妻子,我所有的书都得到了她的帮助。

M. I. 芬利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

1972年7月24日



第一章 领袖与追随者

也许最广为人知、无疑也是最能自吹自擂的现代民意调查研究“发现”(discovery)[▲],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选民都是既冷漠又无知的人。他们不能陈述重大问题,对大多数这类问题漠不关心。很多选民不知道共同市场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联合国为何物。许多选民不晓得他们的代表的名字,或者对哪个人在竞选什么职位一无所知。议员们在吸引民众参与一场游说活动时,如果他们明智的,就始终会随身亮出下面这样的告示:“如果不能确认你们自己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那么可以在你们的公共图书馆获悉他们的名字。”¹ 在一些国家,大多数选民甚至嫌麻烦而不愿行使自己的宝贵投票权利。

人们不仅对民主制如何发挥功能这样的描述性问题,而且对民主制应当如何行事这样的说明性问题或规范性问题——如果算作问题的话——存在着争议。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学术讨论针对民主制的主题,其中有些讨论在古典史家那里有所“回应”。当⁴

[▲] 我在引号中使用“发现”一词,因为较老资格的政治分析家非常熟悉我说的这种现象。



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写道:极端主义运动“对于社会各阶层中的不满现实者和心理空虚者,失意者,孤闭者,生活无保障的人,文盲,不懂世故和崇尚威权的人都具有吸引力”时,² 这种对没有教养和不谙世故的人的“强调”,简直就是柏拉图对鞋匠和小店主们在政治决策中所起作用始终持否定态度的“还魂再生”。**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民主制存在于一个拥有大片田地和相对多数的农民与牧人的国家,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地,不经常会面,或者没有聚会的必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9a19—38)。此时我们会感到亚里士多德与当代政治学家莫里斯·琼斯(W. H. Morris Jones)存在亲缘关系。莫里斯·琼斯在一篇题目颇值得玩味的文章《捍卫冷漠》中写道:“很多与投票义务这个一般性主题有关的思想,恰恰属于极权主义的阵营,不适合用来表达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政治冷漠是“理解与容忍人类多样性的标志”,并“对政治生活状况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它“或多或少是对抗狂热者的有效力量,而狂热者是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真正危险”。³

- 5 我得赶紧补充一点,我无意于研究这个陈腐的题目,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如果利普赛特教授得知自己被称为柏拉图主义者,他或许会感到震惊,多半会惊骇。我怀疑莫里斯·琼斯教授是否会认为自己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首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 美国政治学家,生卒年代为 1922—2006 年,对民主制进行过比较研究。——译者

** 柏拉图在《理想国》等著作中对极端民主这种穷人的暴政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有违公正原则。——译者

